战地纪实

前线采访

陆　诒



陆诒，上海市人，1911年8月出生。1931年8月，进上海《新闻报》实习。“1·28”抗战第二天，即赴前线采访。以后，以该报记者名义，遍访各省。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即赴卢沟桥前线采访。同年10月，转入上海《大公报》为战地记者，曾赴太原、临汾、西安、延安等地采访。1938年1月，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编委兼采访主任，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9年赴华北敌后战场采访，1940年返重庆，又转往昆明采访滇缅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香港、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印度、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甸战区，重返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解放后任上海《新闻日报》编委、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社历届理事，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热河失陷目击记》、《前线巡视记》、《战地萍踪》和《文史杂记》等。

首次渡河到山西战场

1937 年 10 月中旬,我由范长江介绍进上海《大公报》工作。不到一个礼拜，《大公报》派我到山西战场当战地记者。范长江对我说,《大公报》派驻山西战场的记者已有孟秋江和邱溪映(后改名邱岗同志）两人。孟随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在忻口一带采访,邱随八路军 115 师在五台山地区活动，但目前的采访人力不够，还要再派人去加强山西战场的采访工作。范长江认为山西是华北的根本，山西不守则华北永远不得翻身。从军事地理形势上看，敌军入侵，决不限于黄河；从政治角度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属的 115 师、120 师和 129 师于 9 月初出师抗日，首先渡河进入山西战场，这正是全国军民密切注视的希望所在。

我告别上海故乡的时候，“8·13”抗战正进入高潮,日军的炮火早已封锁上海北站，又把上海南站炸成一片焦土，铁路交通在白天受到敌机威胁，根本不通。只有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先到嘉兴，由苏嘉路到苏州，再转沪宁路到南京。

上海西站地处越界筑路，当时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闸北和大场的枪炮声清晰可闻。敌机还常来低空扫射，也无所谓空袭警报。站内外伤兵、难民挤作一团,大哭小喊,幸有警察在场维持秩序,铁路员工也尽责服务，秩序还不乱，客车准时开出。等到上车离开上

海后,铁路沿线就比较乱了。一到南京,一天连发多次空袭警报,我因为要办妥军委会战地记者护照，少不了要跑机关找人、办事，都感到困难。只有硬着头皮，在警报声中东奔西走。诸事办妥，我在当晚搭轮渡过江，到浦口搭津浦路火车北上。路上兵车多，客车少，我为了赶路，不管它是兵车还是客车，见车就上。好在我有军委会护照在身，不怕军警阻拦。赶到徐州，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休息一天，第二天即转上陇海路火车赶路，奔波两天，到达天险潼关。

我首先进入山西战场是从潼关风陵渡过黄河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古代诗人李白描绘黄河雄伟景色的名句。如果我们把山西全省和陕西省北部和中部的地图挂在墙上加以观察，就觉得上述诗句，写得恰如其分。

我服从渡河司令部的统一安排，随川军邓锡侯部队渡河。登上一艘木船，由两名船夫驾驶。一位舵工已年过 6 旬,鬓发皆白,另一位年轻力壮,用竹竿撑船。在老舵手精心指挥下,先是逆流而上,后是随奔腾东下的惊涛骇浪漂向对岸。

对岸就是山西省同蒲路终点风陵渡。我在火车站候车，巧遇川军邓锡侯军长。

邓身材矮胖,在川军中以机警善变闻名,人称‘水晶猴子”。4 年前,我到成都访问过他,他尚未忘记。那天,他身穿草绿色哔叽军装,外面披一件西装夹大衣,精神很好,见到记者显得很兴奋。我首先对他说‘‘你是我到山西战场遇到的第一位抗日将领。”

他感慨地回答我：“不瞒记者先生说，四川军人打了多年内战，历来名声不好,人民害怕、讨厌我们,甚至恨之入骨。这次我军奉命出川抗战，人民对我们刮目相看。从成都出发，徒步行军，翻越秦岭，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送。许多人在门口燃放爆竹，敲锣打鼓，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对我们都满怀着热烈的期望。这种生平难遇的场面，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从陕西的宝鸡开始，我们就坐上陇海路上的兵车到潼关,沿途也有群众欢送,送茶水、水果等,可

见人心所向,都盼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现在已到达目的地,我们决心与战区友军密切配合，团结抗战，一起去争取抗战的胜利。”

他又坦率地告诉我，当年他虽与山西的阎锡山称兄道弟，有过函电来往，但对山西的地形和情况并不熟悉。今天要在这个山地打一场抗日战争，却很少把握。但对抗战前途他极有信心，深信只要国内团结一致，就一定可以取得最后胜利。

同蒲路上军情紧急，当时客货车一律停开，由晋绥军派员驻站统一指挥军事运输,兵车陆续开出,昼夜不息。当天晚上,邓军长和司令部人员先走，我被安排在最后一班兵车启程。

阎锡山据有山西地盘，一向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他所修筑的同蒲铁路是窄轨，机车和客货列车与我国其他铁路上的都不一样，战时无法调节使用，直接影响军事运输。日军已攻入山西内地，军运急如星火，但这条窄轨的同蒲路上军运仍像老牛破车，效率奇低。我在兵车上颠簸了一昼夜，于 10 月 30 日早上到达太原。当时战局已急转直下，晋东的娘子关已于 10 月 26 日失守。我军虽尚在忻口一带浴血苦战,但娘子关一失,势必后撤,太原已成为危城。

一到太原，我立即到首义门内的青年会宿舍找到同事孟秋江。他一见我,啼笑皆非地说:“老兄来的不是时候,如今大家都在打背包准备走路，而您却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太原干什么呢？”等我行装安放以后，他就陪我去八路军办事处。

走上太原街头，只见所有商店门户紧闭，行人稀少，满街是三五成群的军人。有带枪的也有徒手的，还有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老孟说,前方不利消息不断传来,太原就出现慌张现象,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不在城里办公，连记者也不知此公行踪。全城只有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仍稳如泰山，工作如常。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所早已停课的学校里。我们先去访问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将军，想通过他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同志。彭雪枫是河南省镇平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位智勇兼备的青

年将领。西安事变前，他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秘密赴太原，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对争取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保持中立起过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前夕，为团结西北军、晋绥军共同抗日，他不怕艰难险阻，曾到华北各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彭雪枫将军身穿灰布棉军装，外面还披上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军大衣，脸色红润，仪表清秀，举止文雅，外表上不像是个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干部。

吃完早餐，周恩来同志在彭处长陪同下走过来。他和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交谈。他先问淞沪战场作战的情况和我从上海出发后途中所见所闻，又问我范长江的工作近况。然后他说：“抗战以来，你们几位在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我们都看到了。你们深入前线，为抗战的宣传报道作出了贡献，这很好。我们也欢迎你们到八路军中来采访。”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很平易近人。

日军入侵山西，长驱直入，太原危在旦夕，我们要求他分析山西当前的战局。他站起来，叫人拿来一根细木棍，指点墙上挂的军用地图说：“即使处在目前这样危急的军事态势下，我们在山西战场还是大有可为，绝对没有悲观失望的理由。首先，必须充分动员群众，使这次民族抗战真正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战争。其次，必须放弃目前这种单纯防御战术，采取攻势防御。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战场，但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使用于侧翼，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主动打击敌人。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八路军今天在山西战场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深入敌人的后方，破坏他们的运输线，捣毁他们的战略基地。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战，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认为，今天所有在山西的部队，不管是中央军、晋绥军，还是从外省调来的地方部队，都是我们共同抗战的友军，坚决团结他们，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在山西抗战到底。坚持在山西抗战，对整个抗战全局，特别是对华北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

最后，他指点我们，目前太原面临的威胁，主要是自晋东娘子关沿正太路进犯的日军，攻势比较猛烈。我军有从平汉路调来的孙连仲和冯钦哉部队在作正面抵抗，最近又调川军邓锡侯部队前往增援，估计战斗一定很激烈。八路军 129 师原在晋东南地区活动，听到娘子关失守，已赶到测鱼、西马山一带山地，展开对敌人侧翼的进攻，以配合正面友军的作战。他要我们最好及时赶到前线采访。

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我们即抓紧时间，赶去访问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傅将军的嫡系部队和作战基地历年都在绥远。当大同失守、晋北门户洞开之时，阎锡山却要他火速离开绥远防区，来到晋北指挥其他晋绥军，坚守雁门关防线。当时同他并肩作战的还有中央军第 14 集团军郝梦麟军长所部中央军。日军第 5 师团攻势甚猛，郝梦麟军长作战中壮烈牺牲。傅将军指挥所部虽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军攻势。在此紧要关头，阎锡山又委傅将军为太原城防司令，叫他死守太原，与危城共存亡。

傅将军在太原寄住在晋绥军另一位高级将领的官邸中，我与孟秋江和他是熟人,见面非常诚恳与坦率。他说“抗战中受点挫折不可怕，只要吸取教训，及时改进就好。我们在雁门关一线没有挡住日军的进攻，主要是由于上面指挥失当，各友邻部队也没有配合好。当时如果没有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胜仗，打击日军的猖狂气焰，掩护友军退却，我们今天的处境还会更加危险。”谈到太原的守备，他说“大敌当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追随阎长官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未退缩过。今天参加民族抗战,只要上级命令我守城,即使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但守城不是一句空话，此刻就要调集军队，加固防御工事，疏散伤兵和难民等等。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曾遍访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做了大量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太原被围之前，他曾

恳切地忠告傅作义将军说:“将军当年死守涿州,英勇善战,闻名全国。但是当时作战的对象是关外奉军。今天我们的对象是拥有优势装备的日军。这是一场持久战。在战略上,我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紧要的是要保存有生力量,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忠告对傅将军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在达到杀伤敌人、掩护大军撤退目的以后,即于 11 月 8 日,下令撤离太原,率领少数部队通过晋西北,返回绥远防区,坚持抗战。

我和孟秋江在街上找到一位卖烘山芋的,两人坐在摊位上吃了一顿。他又带我去访问驻太原的军邮负责人傅定远先生。傅先生指挥的十几辆军邮卡车,来往前线投递邮件,因此他对部队调动的讯息非常灵通,这既是极好的新闻线索,又有可供方便的交通工具。11 月 1 日清早,我和孟秋江都搭上军邮专车分头出发。他去太原以北的石岭关前线,我去晋东寿阳前线。

军邮专车一直把我送到寿阳附近的邓锡侯军长的前线指挥所。一见面,邓军长就把心头的一股闷气向我倾诉。他说:“一到太原,首先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报到。此人官架十足,命我立即率部赶到晋东阳泉前线,增援孙连仲部队。我就告诉他,部队在太原未作停留,已由孙震副军长率领日夜兼程奔赴前线。我向他恳求发给山西制造的山炮和棉军服,他竟一毛不拔,连向他要一张山西详细的军用地图也不给,真是令人气愤。”说到这里,又转怒为喜地接下去说:“正当我感到闷闷不乐的时候,就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请教周恩来先生。不料周先生仅带一名通讯员,到招待所亲自来访,使我十分激动。周先生为我详细介绍山西抗战以来的情况,并分析当前战局形势,恳谈两个小时,还特意送我几张平型关战役中缴获来的日本军用地图(山西部分),真是雪中送炭 共产党人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的诚意,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谈话的时候,军用电话铃声不断,前线传来许多不利的消息。2 日上午日军前锋已进抵寿阳以南 40 里的地点,川军挡不住

日军陆、空军配合的猛烈攻势，节节败退下来，邓军长坦率地告诉我：“目前我的主要任务是，先要切实掌握好部队，避免部队溃散，并择路作有秩序的撤退。我现在对友邻部队也联系不上，无法协助你去找八路军 129 师,你还是暂退榆次为好。’我就此告辞,当晚和一部分人搭上一列伤兵列车，从正太路上撤退到榆次。

第二天刚刚天亮，我尚未走下伤兵列车,40 架敌机飞来猛炸车站和伤兵列车。我在一片混乱中与川军部队失去联系，就杂在逃难的难民中连夜徒步 70 里走到太谷。这里是国民党政府要员孔祥熙的故乡,城内街道整齐,道路宽敞,又都是瓦房。特别是著名的铭贤学校校舍漂亮,建筑考究。现在经过几次敌机轰炸、扫射,居民早逃避一空,商店关门,满目凄凉。城内没有找到卖点心吃的,于是走到车站去寻找，果然找到卖馒头和当地土产柿饼的。先解决饥饿和喝水问题,再采访同蒲路太谷车站情况。白天怕空袭,火车停驶,每晚尚有三次不定期的列车向临汾开。等到傍晚，我见到有一列火车停靠在站上，每节车旁都有晋绥军的士兵持枪把守，我因有南京军委会发给的战地记者证明文件上了车。

我走了几天，实在疲劳极了，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临汾,我随同车的伤兵、难民下了车,在一家骡马店里住下来。我在门口吃面时，碰见了原北平上海《新闻报》驻平办事处主任耿坚白兄。他在平津沦陷以后，就辞去职务，携家眷返回西安故乡。后应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之聘,直接来到娘子关前线采访,先后访问了黄绍竑、孙连仲等前方将领。娘子关失守后，他也不在太原停留，先退到临汾。他早就摸透了阎锡山的“两面派”性格，对他不存幻想，而是寄希望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

三天以后，八路军办事处也迁到了临汾。我和耿坚白兄即赶往访问，不仅见到彭雪枫将军，还见到辞别不久的孟秋江。老孟说：“太原危急时，如果不是紧跟周恩来同志和彭雪枫将军撤退，就过不了难关。他们对战地记者爱护备至，真是令人感动！”

三个记者会在一起谈当前山西的战局形势，都认为目前还是混乱阶段。当地临汾尚未建立军邮，而电报局、邮局的办事效率太慢，不如老耿和我先回西安建立办事处，和老孟保持联系的好。我们遂决定三人先写通讯，然后由我和耿坚白回西安寄出。两天以后，我随耿坚白兄仍坐同蒲路车回风陵渡，再渡河搭陇海路车返西安。

再渡黄河访敌后战场

首次渡河进山西战场，是在 1937 年 10 月,我从潼关对岸风陵渡过的黄河。到了 1939 年 9 月,再到山西战场,是从河南省的渑池过河到山西省垣曲的。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入侵山西的日军,早已占领了大同、太原、临汾等重要城市,还占领了正太和同蒲两条铁路线及山西境内主要的公路线，从山西北部进犯晋南三角地带，攻占了风陵渡。隔河炮轰潼关，阻断对岸陇海铁路交通。形势如此危急，但是我几十万抗日大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 18 集团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和四川部队，仍在当地人民有力的支援下，继续留在黄河以北浴血奋战。日军纵然杀到了风陵渡口，也只好望河兴叹，不敢轻易过河。

过河之前，我先在洛阳停留两天，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寄峤将军。据他说，卫立煌司令长官尚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另一位副司令长官即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是朱德将军。几年来，卫将军有个老习惯，每逢黄河北岸中条山发生战斗，他总在洛阳呆不住，一定要亲自过河，就近指挥部队作战。这几天又到设在垣曲的前线指挥所去了。我只好赶赴垣曲。

垣曲,背靠形势险要的中条山,面向咆哮的黄河。过去一年,县城三次被日军占领。但由于我军在外围坚持战斗，反复争夺，日军

始终站不住脚。敌机曾在此投下几千颗炸弹，加上日军烧杀抢掠，破坏极其严重。我骑马穿过县城时，从东门可以一眼见到西门，一片焦土，满目创伤。城里不见行人，原来居民都住在半山的窑洞里了。他们对战争已习以为常，日军进攻时，他们就坚壁清野，随军避入深山。每当我军反攻收复失地时，他们又随军回家，协助军队做点后勤工作。

我被招待住在离城 3 里的辛庄一个窑洞里。当晚，卫立煌将军就热情地接见了我。他身穿一套灰布军装，腰束一根小皮带，脸色红润，留有八字胡子，显得很威武。他开场白说："真诚欢迎你到中条山山沟里来采访。你来自大后方重庆，又是《新华日报》记者。听洛阳郭寄峤将军介绍，你经历过'8·13'上海抗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见多识广。这次来到山西战场，你一定可以得到前所未遇的新鲜见闻。"抗战以来，卫将军从参加晋北忻口战役起，一直在山西作战，我就请他先谈谈山西战场。

卫将军说："我出身行伍，没有进过保定或黄埔军校，在军事学上我说不出什么深奥的道理。但也要老实说，我打了多年的内战，有失败也有过胜利。据实战中的切身感受而言，打仗总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而三者之中，尤以人和为首要条件。在这点上，我对八路军在山西战场上全力团结，配合友军作战，深表由衷的敬佩！"

他又说："我历来根据事实说话。抗战初期我在晋北忻口一带作战时，曾得到八路军 120 师贺龙将军的有力支援。他们在敌后，把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切断了，使忻口正面进攻的日军的汽油、弹药和一切补给来源中断，仅靠运输量有限的空投来解决困难。这样就使我军在前线有时间可以调整和补充。如果不是晋东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忻口我军防御战还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

他又补充说："太原失守以后，我撤退到临汾以南某地，有一次被日军包围袭击，当即用无线电向友邻部队求援。不久，就有八路

军一团人杀入重围,击退日军,救我出险。事后,我约见这位青年团长，向他郑重道谢。这位团长告我不必称谢，这次战斗是朱总司令亲自指挥的，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后来我从山西战场退下来，路过延安，竟受到毛泽东先生和当地党、政、军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款待，当地抗日军政大学还请我去演讲，这种场面使我非常感奋。同毛先生见面时，我深感心中有愧！我说：‘败军之将，实在愧不敢当。’但毛先生的回答却非常痛快、诚恳。他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只要你坚持抗战,我们就欢迎!’最近两年来,历次中条山‘反扫荡’战役中，我们都得到在太行山、太岳和吕梁山作战的八路军有效的配合。如果没有他们在敌后坚持作战，有力地支援我们，我们在中条山是站不住脚的！”

我说“:我从重庆来,大后方有一部分人说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依你在华北战场上亲眼目睹,事实是否如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生气地说“:大后方说这种话的人是造谣诬蔑,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局。试问，置身于华北敌后战场，周围都受敌人的包围和封锁,就是你想‘游而不击’,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不信,你可以到中条山来试一试。抗战以来,我一直同八路军配合作战,接触较多,深知他们是坚决抗战又能团结友军协同作战的部队，就是对有些作战不力或纪律不好的部队，他们也总是耐心劝导，还在战场上积极予以支援。”

谈话结束时，我请他设法帮助我穿过中条山我军防线，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去。

第二天清早，卫将军派人来请我。我见他换了一套军装，脚上缠了绑腿,并换穿跑鞋,兴致勃勃。他说“:你到山西战场的第一课，先要学好爬山。这里山多平原少,不会爬山,那就寸步难行啊!”我说“:我拜你为师!”他邀我共进早餐。

中午，卫立煌将军在指挥所邀请路过的八路军 129 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共进午餐，他又邀我作陪。席间，他把我介绍给邓政委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拜托你带一位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到 18 集团军总部去”邓政委风趣地回答“:当然欢迎 暨东南总部附近就有《新华日报》的华北版,他到那里,应该是回娘家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傍晚，我到驻地去拜访邓小平同志，并出示报社介绍信。他亲切地问我恩来同志和报社近况，又详细问我经过五战区和一战区的见闻,我都向他如实汇报。接着,他就说“:恩来同志指示你一路上要访问几个著名的抗日将领，并把他们的谈话发表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像张自忠和卫立煌将军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打过硬仗的人,他们至今仍坚持抗战,难能可贵。我们就要表扬他们,以加强团结。团结坚持抗战的人越多,就越好!”

他又问我随身有几件行李，还缺什么日用品？能不能穿草鞋走山路？能不能骑马打枪？我说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大声说“:那好办,明早六点准时在此地集合,同我们一起出发!”

9 月 6 日上午,我们动身向中条山前进。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介绍他的夫人卓琳同志和其他随行人员同我认识。这次同行的有一个班的八路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还有从延安来的男女工作干部 18 人,随带 5 匹牲口，驮载一部分行李和延安印刷出版的书报、刊物。

第一天行军只走 50 里。山路崎岖难走，有一段只能单人通过，牲口得有人小心翼翼牵着走，否则就要滑倒。山上云雾缭绕，气候瞬息变化。50 里以内，只见到三四个孤立的农舍，真可称为穷乡僻壤,如果大部队过境,很难解决食宿问题。到了下午 9 点,邓政委命令不走了,就地露宿。第二天继续行军,中午经过阳城县城,这里被我军收复不久，日军烧杀抢掠的迹象尚历历在目。

通过晋城、高平县境的农村，常遇到十几岁的儿童团团员，手执红缨枪，威风凛凛地在村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的路条，非常认真。当地还有人民自卫团组织，在抗战的烽火中，人民群众已逐步

组织起来，直接参加战斗。我跑过许多正面战场，这次到山西战场，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进入陵川县境，开始走上险峻雄伟的太行山脉。山高风大，我们只穿单军装，感到寒意。远处壶关激战的炮声清晰可闻。在犬牙交错的敌后战场行军，经常要绕道而行，有时距日军据点只有里把路,或者相隔一座山。而我们居然能白天从容行进,晚上休息,全靠当地群众及时传送情报，使我们得以充分掌握附近日军动态。当时日军虽然占领了长治、壶关等重要城镇，但广大农村中的人民群众，仍然热烈支持抗日政权，配合我军作战。

过平顺县境,就到达浊漳河边,正逢山洪暴发,水流湍急,难以过河。幸得当地农民引导，选定河水最浅处徒涉。我们脱去鞋袜，把军裤卷得高高的 [illegible]过去。北方深秋水冷，我上岸时发抖不已。继续行军,再走 10 里,遇到 129 师 24 团韦团长，他热烈欢迎我们到团部驻地,烤火,烘干浸湿的衣裤。当晚,这位广西籍的韦团长向邓政委汇报赴冀南进行平原游击战的经过。他认为山西的地形条件虽好,但人力、物力远远比不上平原丰富,希望部队经过整训后,仍回河北平原战斗。

9 月 15 日下午,我们继续前进,韦团长派了一排武装战士,护送我们通过黎城到东阳关那段白晋公路的封锁线。当晚 10 时出发。接近封锁线时，战士们紧握刀枪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跨上白晋公路，我前面一位女同志行动稍迟缓，影响了后续队伍。过了封锁线,有 6 人掉队，我也在其中。又走了一小时，我们又与大队会合了。当晚宿于南村，此地距日军据点黎城仅 15 里。

16 日清早 7 时，南村人民自卫团团员紧急通知，一部分日军已出黎城 10 里,向南村方向行进。他催促我们迅速转移,一面又动员村里老乡们立刻上山，实行坚壁清野。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出发，向辽县(今为左权县)方向前进。走了一天,傍晚到达桐峪镇。这里就是 129 师师部驻地。

刘伯承将军是我国著名的战略家，久闻其名，人们称颂他用兵如神，英勇善战。我想象中以为他是一位威武的军人，但那天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他说话慢条斯理，带有浓重的四川乡音。我跟随邓小平同志走进他的屋子时，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正在伏案逐字、逐句地校对他的译著《苏联步兵操典》。他身材魁梧,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军服,剃着光头。经邓小平同志介绍,他同我紧紧握手,笑呵呵地对我说:"今晚不但欢迎小平同志从延安新婚回来，也欢迎你从重庆远道而来，总得添点菜招待一番嘛!"这时,我才明白邓政委和卓琳同志是蜜月行军。刘伯承同志说罢，就叫警卫员准备晚餐，并要他去通知李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同志共进晚餐。不到五分钟，李达参谋长与蔡树藩同志都到齐。具有战时特色的会餐旋即在屋子里开始。

第二天上午，我参加师部举行的"9·18"纪念大会，晚上观看政治部演出的文娱节目，有活报剧、歌咏和舞蹈。战地剧场设在露天广场，点起汽油灯，军民席地而坐看节目。当时还没有设首长席，刘伯承将军和邓政委都坐在后面倒数的第五排。

9 月 19 日早上，刘伯承将军派人通知我，他和邓政委今日动身到八路军总部开会，邀我同行。刘将军分配我一匹红马，并嘱咐我:"沿途,我们还要三顾茅庐访诸葛亮,你要跟我们慢慢走,既不能性急，又不能掉队啊！"我们策马沿太行山西行，沿途危崖矗立，山石峥嵘。有位警卫员在马上引吭高歌《我们在太行山上》。

下午 4 时,到蟠龙镇。刘将军宣布:"今天不走了,我们要到附近医院里去看望伤病员同志。"当晚就住在医院里，并与伤病员一起会餐。会餐时，刘将军和伤病员亲切交谈。有的伤员不安心住院，要求立即出院重返前线。刘将军耐心地说服他们好好养伤，伤好后再重返前线杀敌。几个性急的伤员被说得口服心服。

翌晨,我们又骑马到 5 里外的一个山村,访问 129 师修械所。刘将军和邓政委问他们最近群众破坏平汉路拆下来的一部分钢轨

能不能制造武器？工人们都说，这是制造刺刀的好钢材。邓政委高兴地说“能制造刺刀就好,当前战场上正需要刺刀。”这个修械所不仅可以修理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还生产一批手榴弹和刺刀。这 30 位技术工人都是抱着爱国热诚，自愿到山沟里来的。刘将军严肃地对我说：“记者同志应记上一笔。别小看这个破破烂烂的摊子，他们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贡献很大啊！我们打仗的武器，蒋介石先生不会来补充的，其中一大半要靠敌人送上门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大型兵工厂,先搞点修修配配,也有必要。”

9 月 21 日又上马飞奔,10 日就到了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这一带山高沟深,地形复杂,总部和它的附属机关、直属部队都驻在附近的小村庄里。走近总部,我想,从师部出发,刘将军说是沿途要访问诸葛亮的，怎么还未见到诸葛先生？再一思考，原来他所说的诸葛亮，就是指伤病员同志和修械所中的老师傅。

我采访过正面战场，也访问过不少国民党部队的总司令部，大都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目标显著。但今天走到八路军总部门口,竟连一个站岗的战士也找不到。再细细观察，才见手执钢枪的战士正站在树上和屋顶上放哨，他们警惕地注视周围的动静。我随刘将军等跨进大门口，发现总部人员也极少，只有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几位作战参谋。左权将军身穿整洁的军装，英气勃勃，热情诚恳地接待我们。他告诉我：朱老总在篮球场上和青年战士打球，过一会就回来。彭老总到陈赓将军旅部去视察部队，要过几天才回来。

正当我们在总部与左权副参谋长欢谈之际，朱德总司令来了。他身穿运动员的汗背心，精神抖擞。他关切地向我询问重庆《新华日报》情况和周恩来同志近况。午餐后,我跃马直奔华北版驻地。途中见对面山上，何云与陈克寒同志正飞驰而来。我们武汉一别几年,情绪激动。走到村口,克寒同志提醒我“前面老乡家里,就是华北版的编辑部。”看到门口有许多同志鼓掌热烈欢迎我。

1942 年 5 月,日寇 3 万多人发动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扫

荡战”,我军奋起展开‘反扫荡’战役,伤毙敌军 5000 多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激战中,我军民也有重大伤亡。左权副参谋长就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同志和报社黄君钰同志等也牺牲在太行山上。行文至此,我再次向先烈们深切悼念!

我到达《新华日报》华北版,还不是这次采访华北敌后战场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以后,我还到了冀南、冀中平原,再到晋察冀、冀察热等抗日根据地采访。

台儿庄之战

1938 年 3 月底,我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汉口青年会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大会。当时鲁南战场的战斗,规模越打越大,前线已十分紧急。开完会,我们匆匆回徐州。时已 4 月初,日军正向我台儿庄大举进攻,企图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然后夺取津浦与陇海铁路交通的枢纽——徐州,再进攻武汉。

当晚,我们就去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访问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白当时任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最近奉命到徐州来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他们都关切武汉的政治动态。我们问到当前战局情况,李宗仁首推白将军先说。白崇禧忙于接电话,还是由李司令长官先说:“这几天,台儿庄正面战场上打得很激烈。第 2 集团军孙连仲所部 30 军坚守台儿庄,浴血奋战,阵地上每天落下日军炮弹 6000 多发,伤亡惨重。我已命令 20 军团汤恩伯所部迅速南下,侧击日军,以分散日军火力,减轻对台儿庄守军的压力。前方战局瞬息万变,我建议你们两位明天即去第一线现场采访,不要像有些记者那样常驻徐州,伸手向我们要战报。其实,我们从下面发来的战报都是第二手材料,有的甚至虚报战绩。”

第二天上午，我们即搭军车直奔 20 军团汤恩伯将军的前线指挥所,他们位于台儿庄的东北方向,正是日军的侧翼。汤军团直辖 3 个军(52 军关麟征、81 军王仲廉和 13 军军长由汤恩伯自兼，实际由副军长张轸负责),共计 6 个师(第 2 师郑洞国、第 25 师张耀明、第 4 师陈大庆、第 89 师张雪中、第 110 师张轸和新 5 师李铣),最初奉命支援津浦路北段川军 22 集团军作战。不料部队到达时,滕县县城在前一天失守,王铭章师长已经壮烈牺牲,他们只能掩护友军退却。日军矶谷师团趾高气扬南下之时， 20 军团奉命让开津浦路正面,暂退抱犊崮东南山区,以避其锋,而日军则循津浦路薛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直扑台儿庄。

汤恩伯将军在一间农舍中接见我们。他说:"打运动战,就要日夜行军,主动找敌人的弱点打。过去我们死守阵地,作单纯的防御战,吃过很大的亏。现在我军主动攻击日军的侧翼,以支援坚守台儿庄的友军。在这次作战中,110 师和新 5 师打得不错,尤以新 5 师第 1 旅高侠轩部,猛打猛冲,伤亡重大。"

4 月 5 日,我和范长江从 52 军第 25 师师部骑马到第 2 集团军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所，他正忙于接待刚从徐州来访的 20 多位中外记者和外宾,在一个大院子里举行茶话会。每人位子面前放一只农村中用的粗瓷大碗,倒一杯红茶,别无其他,确是名副其实。孙连仲将军身穿军装,魁梧高大,是一位当年西北军善于打防守战的名将。但却拙于口才。他让作战参谋先谈台儿庄之战的经过,使我们对目前战局有个初步了解。那天宾客中有国民党中央社战地记者曹聚仁教授及其新婚夫人邓珂云(香港《立报》记者)、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著名的荷兰纪录影片导演伊文思和曾经到山西五台山参观过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伊文斯、卡尔逊上校。此外,还有汉口《扫荡报》、《武汉日报》和其他各报的战地记者。

进攻台儿庄的日军的前锋，是矶谷师团所属的濑谷旅团 。他们沿津浦铁路支线长驱直入,骄横不可一世,未料到在台儿庄前遇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